

# 滕胧诗 新编

洪子斌  
程光焯

编选



北岛 芒克 多多 岳重 食指 黄翔 方含 齐云 田晓青 林莽 顾城 舒婷 杨炼 江河 王妮 桑克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朦胧诗新编

洪子诚  
程光焯  
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滕胧诗新编/洪子诚 程光炜 编选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6

ISBN 7-5354-2804-5

I.滕…

II.①洪…②程…

III.滕胧诗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4417 号

责任编辑:沉河 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---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640×920 毫米 1/16 印张:23

版次: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8500 行 印数:1—15000 册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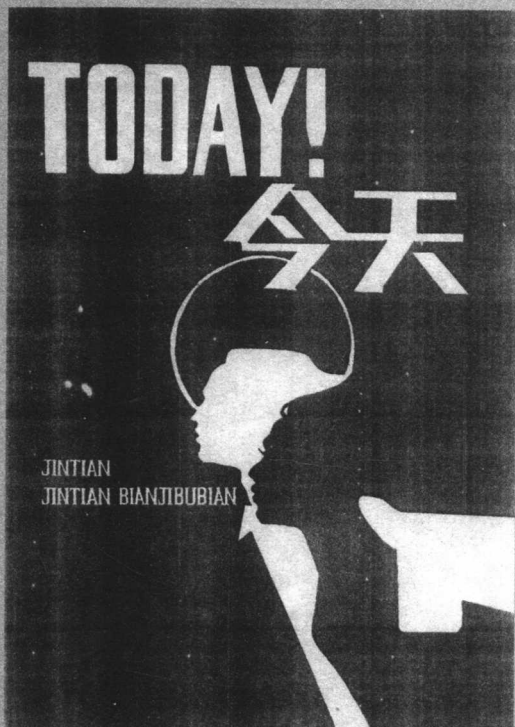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2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首届今天诗歌奖获奖者作品集

**里程**

多多诗选

1972 ——— 1988



# TODAY!

## 诗歌朗诵音乐会

主办单位：《今天》编辑部

时间：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点半

地点：玉渊潭八一游泳馆附近的草坪（从军事博物馆向西往北）

请君光临！

## 诗歌朗诵音乐会

主办单位：《今天》编辑部

时间：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二点半

地点：玉渊潭八一游泳馆附近的草坪（从军事博物馆向西往北）

请君光临！

自七十年代初期至今，多<sup>孤独地</sup>在诗坛上不倦的探索，一直激励着和影响者许多同时代的诗人。他通过对痛苦的认识，对个体生命的内省，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，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，开拓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与表现力。

——首届今天诗歌奖颁奖词

北岛诗选





两位女士右为舒婷，左为徐晓。其他为北岛、赵南、周英、陈延生、芒克、黄锐、江河、甘铁生和赵振先。摄于1980年。



自右向左：北岛、芒克；为1978年创办《今天》时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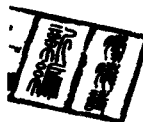


1979年夏在北京紫竹园公园。前排左起：史康成、芒克、黄锐、于友译（江河）、徐晓；中排左起：鄂复明、刘念春、北岛、黑大春；后排左起：赵振先、刘建平、周眉英、王捷、甘铁生、万之。

# 序

洪子诚

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和朦胧诗运动，距今已经二十余年。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代，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、文学“解放”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时，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。它所表现的激情与表达方式，为后来的新诗写作者开启了富有成效的创造空间。今天，重新编选这些作品，不仅出于诗歌史研究上的考虑，也是为着对朦胧诗的那些并未失去的价值的重新确认。



## 《今天》的创办

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当代诗歌的创新活力，主要来自“复出诗人”的创作，特别是来自“崛起”的，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“新诗潮”。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“文革”期间，一些地方存在着后来被称为“地下诗歌”的“潜流”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社会政治、诗歌文化环境出现重要变化。在目标上，带有与“当代”前三十年的诗歌主流“断裂”的诗歌思潮开始涌动，并在当时呈现“反叛”的姿态。这种“断裂”，既是诗歌“内容”（取材，表达的观念、情绪）上的，也表现在艺术方法方面。它们由于表现了某种“异质”倾向，而不能为当时的“主流诗界”普遍认可。不过，在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和大学学生的阅读群体中，已迅速蔓延，并产生强烈反响。大多数作品难以在由国家控制的报刊上登载，因而，最初采用“非正式”的发表方式。“文革”期间延续下来的传抄仍是主要手段，而自办诗报、诗刊、自印诗集，也开始成为重要方式。许多城市，特别是一些大学，出现了同人性质的诗刊，并形成各种诗歌“小圈子”。最早创办并影响广泛，后来与朦胧诗有密切关联的自办刊物，是出现于北京的《今天》。



《今天》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,由北岛、芒克等主办<sup>①</sup>。它刊登小说、诗、评论和少量外国文学译介文字<sup>②</sup>。小说虽然占据不小的分量,但主要影响是诗歌。创刊号上署名“本刊编辑部”的《致读者》(代发刊词,由北岛执笔),表达了《今天》同仁当时的社会、诗歌理想。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“文革”期间实行的“文化专制”之后,表达了一种人们普遍存在的“创世纪”激情,……“四五”运动<sup>③</sup>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,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,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;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,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,我们的文学艺术,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。

《致读者》之后的宣告是:“今天,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,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,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。……我们的今天,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,植根于为之而生,为之而死的信念中。过去的已经过去,未来尚且遥远,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,今天,只有今天!”

《今天》共出版九期。它刊载了食指、芒克、北岛、方含、舒婷、顾城、江河、杨炼、严力等的写于“文革”期间或写于当时的作品。如舒婷的《致橡树》、《中秋夜》、《四月的黄昏》、《呵,母亲》,北岛的《回答》、《冷酷的希望》、《太阳城札记》、《一切》、《走吧》、《陌生的海滩》、《宣告》、《结局或开始》、《迷途》,芒克的《天空》、《十月的献诗》、《心事》、《路上的月亮》、《秋

---

① 据《鄂复明访谈录》称,《今天》“创办人”为北岛、芒克、黄锐、陆焕兴、孙俊世、张鹏志、陶家楷、马德升:“他们把架子搭起来了。”(《沉沦的圣殿》第149页)另一种说法是,“第一届编委:芒克、北岛、黄锐、刘禹、张鹏志、孙俊世、陆焕兴。《今天》第1期后,因文学及社会见解,编辑部发生分裂,五人退出。遂由芒克、北岛重新牵头成立第二届编委,有北岛(主编)、芒克(副主编)、周郅英、鄂复明、徐晓、陈迈平(万之)、刘念春。后黄锐复来,……赵一凡为幕后编委。”(《沉沦的圣殿》第312页)另外,有多人指出(包括后来在国外出版的《今天》编辑部),赵一凡是《今天》的“创始人之一”。

② 如刊登万之的多篇短篇小说,北岛的中篇《波动》、短篇《在废墟上》、《稿子上的月亮》、《归来的陌生人》(均署石默)、《旋律》(署艾珊),刊登格林(英)、叶甫图申科(苏)、小库尔特·冯尼格特(美)等的短篇小说,多篇评论文字,以及摄影和美术作品等。

③ 发生于1976年4月间的天安门事件,在“文革”后一段时间,被许多人称作与“五四运动”同样具有伟大意义的“四五运动”。

天》、《致渔家兄弟》，食指的《相信未来》、《命运》、《疯狗》、《鱼群三部曲》、《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、《愤怒》，江河的《祖国啊，祖国》、《没有写完的诗》、《星星变奏曲》，顾城的《简历》，杨炼的《乌篷船》，方含的《谣曲》等。其中，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“代表作”。除刊物外，还出版《今天》文学资料三期，《今天》丛书四种<sup>①</sup>。其间，还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活动<sup>②</sup>，并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“星星画展”。1980年9月，《今天》被要求停刊。其后成立“今天文学研究会”，很快也停止了活动<sup>③</sup>。由于《今天》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影响，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“新诗潮”中的地位，《今天》、“今天诗群”的作品，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，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核心，甚至被看作就是朦胧诗。

## 朦胧诗命名与论争

在79—80年间，《今天》诗人的作品（不限于刊发在《今天》上的）广泛流传，已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。一些“正式”出版的文学刊物，也开始慎重地选发他们的诗作，影响因而进一步扩大。1979年3月，《诗刊》登载了发表于《今天》创刊号上的北岛的《回答》；继之，舒婷同样刊于《今天》的《致橡树》、《祖国啊，我亲爱的祖国》等诗也为《诗刊》所采用。这一年10月复刊的《星星》（成都），将顾城的《抒情诗19首》放置在头条的显著位置。《诗刊》在1980年第4期又以“新人新作小辑”的专栏，发表包括“新诗潮”诗人在内的一组作品。在此期间，全国各地的刊物，如《星星》（成都）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萌芽》（上海）、《青春》（南京）、《丑小鸭》（南京）、《芒种》（郑州）、《春风》（沈阳）、《长江文艺》（武汉）、《四川文学》（成都）等，也都陆续发表后来被称为朦胧诗诗人的一些作品。

对以《今天》为代表的“新诗潮”的评价，很快成为诗界的中心话题，并形成对立的意见。公开在“正式”出版物上披露自己观点的，是“复出”



---

① 芒克诗集《心事》，北岛诗集《陌生的海滩》，江河诗集《从这里开始》，艾珊中篇小说《波动》。

② 1979年4月8日和10月21日，均于北京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的小松林举行。

③ 1980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的法令“刊物未经注册，不得出版”，要求《今天》杂志停刊。后申请注册复刊，不被允许，12月再次通知《今天》停止一切活动。

诗人公刘的《新的课题》<sup>①</sup>一文。对于顾城等青年诗人看待历史的“片面”，和情绪的“悲观”，他由衷地感到忧虑；主张给这些敏感的“迷途者”以“引导”，“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”<sup>②</sup>。不过，这些诗人的大多数并不认同被“引导”的位置。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“全国诗歌讨论会”，提供了对立观点激烈争论的场所。有趣的是，不论是认为新诗将出现繁荣前景，还是认为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，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类诗歌的出现。

南宁会议后不久，诗评家谢冕发表了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<sup>③</sup>，对“不拘一格、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，……越来越多的‘背离’诗歌传统”的“一批新诗人”予以支持。他的论断，主要来自于他对诗歌要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”的要求（其实，这同样也是“新诗潮”反对者立论的基点）。谢冕以“历史见证人”的姿态，以理想的“五四”开放的文学精神作为标尺，对诗界提出这样的规劝：“对于这些‘古怪’<sup>④</sup>的诗，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，便要急着出来‘引导’。有的则惶惶不安，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。……但我却主张听听、看看、想想，不要急于‘采取行动’。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（而每次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），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，不同流派，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，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。而那样做的结果，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、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。”这一立场，为一些人所赞同，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。后来，支持新诗潮的批评家孙绍振、徐敬亚，还撰写了《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》和《崛起

① 文章的副标题是《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》。《星星》1979年复刊号，10月出版。《文艺报》1980年第一期转载。

② 《文艺报》转载公刘文章所加的《编者按》也认为，“他们肯于思考，勇于探索，但他们的某些思想、观点，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，或者是可以争议的。如视而不见，任其自生自灭，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；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，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大树来。”

③ 为谢冕在“全国诗歌讨论会”上的发言，经整理后刊发于《光明日报》（北京）1980年5月7日，和《诗探索》（北京）1980年第1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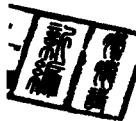
④ 诗评家丁力等在私下把这些有争议的诗称为“反现实主义”的，“脱离现实，脱离生活，脱离时代，脱离人民”的“古怪诗”。这一观点，在他后来的文章《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》（《河北师院学报》1981年第2期）、《古怪诗论质疑》（《诗刊》1980年第12期）公开表达。

的诗群》<sup>①</sup>的文章。他们的观点后来被称为“‘崛起’论”，这三篇文章则被称为“三崛起”。

到了1980年下半年，这些备受争议的诗“无意”中获得同样备受争议的命名：“朦胧诗”。1980年第8期《诗刊》刊载了《令人气闷的“朦胧”》（章明）的文章，对那些“写得十分晦涩、怪僻，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，似懂非懂，半懂不懂，甚至完全不懂，百思不得其解”的作品，称为“朦胧体”。文中引述的诗例虽不是《今天》诗人的作品<sup>②</sup>，但谈及的现象，和后来有关诗歌朦胧、晦涩的争论的举证，则主要来自于“新诗潮”探索者的作品。因为争论的最初阶段，主要围绕艺术革新与阅读习惯、鉴赏心理之间的矛盾展开，“朦胧诗”的名称遂被广泛使用。

1980年，诗歌争论的另一热点发生在福建。《福建文学》（福州）开辟了以舒婷创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“新诗创作问题”专栏，时间持续一年多。编者的按语说，“舒婷的创作，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，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。如何分析这股新诗潮，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，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争议的焦点。”<sup>③</sup>讨论后来从对这一“新的诗歌潮流”的分析，扩展到对中国新诗60年的经验和问题的争辩。

对于朦胧诗，一些老诗人给以积极支持。但另一些有威望的前辈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。他们认为，所谓“朦胧诗”，“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，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一股逆流”<sup>④</sup>；朦胧诗的“理论的核心”，“是以‘我’作为创作的中心，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自己照自己”，“排除了表现‘自我’以外的东西，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”<sup>⑤</sup>。诗界的这些权威者最担心的倒不是朦胧诗本身，“朦胧诗作为一



① 分别刊登于《诗刊》1981年第3期和《当代文艺思潮》（兰州）1983年的第1期。

② 章明文章中的举例，一是“九叶诗人”杜运燮的《秋》，另一是青年诗人李小雨的《海南情思·夜》。

③ 《福建文学》1980年第2期。

④ 《关于朦胧诗》，《河北师院学报》1981年第1期。在1982年《诗刊》等召开的多次会议上，臧克家总是“语调急促，词锋锐利”地批评“朦胧诗”等的“诗歌领域内刮起的一股黑风”。82—83年间，激烈批评“朦胧诗”和“崛起”论的，还有柯岩、朱子奇、周良冲等。参见唐晓渡《我所亲历的80年代（诗刊）》，“诗生活”网站：“诗生活文库”。

⑤ 艾青《从“朦胧诗”谈起》，《文汇报》（上海）1981年5月12日。

种文学现象,不足为奇”。他们最不满的是那些“吹捧朦胧诗,把朦胧诗说成诗歌的发展方向”的批评家。有关朦胧诗评价的争论持续几年时间。支持者认为,这些诗摒弃空洞、虚假的调头和陈腐的套式,探索新的题材,新的表现方法,是“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”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,推动了当代诗歌“多元并立”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。批评者则指责其思想艺术倾向,是“反现实主义”的,是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,背离了文艺的“社会主义方向”。对朦胧诗及“‘崛起’论”的批判,在1983年“清除精神污染”运动中达到“高潮”<sup>①</sup>。但时变境迁,这种依靠政治权利施加的压力已难以顺利奏效。为愤激情绪所控制的扞伐者在当时也未能看清情势:朦胧诗事实上已确立其稳固地位;作为一个“诗歌运动”,它也已处在“退潮”的阶段。

《今天》以及朦胧诗,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。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。其时代意义和诗学贡献是多方面的。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,“个体”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,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。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,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,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,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,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,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。至于说到“朦胧”,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。至少在“当代”中国,“朦胧”并不能从“纯”技术的层面理解,或单纯看成风格问题。朦胧诗与当时“环境”构成的紧张冲突,根源于它的语言的“异质性”,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“语言的反叛”：“拒绝所谓的透明度,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……合作”<sup>②</sup>。因而,“朦胧诗”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,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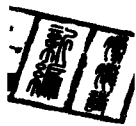
## 秩序建构与“地下诗歌”发掘

<sup>①</sup> 批判朦胧诗及“‘崛起’论”,是1983年10月召开的“重庆诗歌讨论会”的主题。会上集中批判了“对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严重的挑战”的“‘崛起’论”,也对“近年出现”的“颠倒美丑、混淆新旧、空虚绝望、阴暗晦涩”的一类“有严重错误”的诗,如《诺日朗》(杨炼)、《墙》(舒婷)、《慧星》(北岛)、《流水线》(舒婷)、《空隙》(顾城)等,“进行了批评”。参见吕进《重庆诗歌讨论会》,《文艺报》(北京)1983年第12期。

<sup>②</sup> 刘禾《持灯的使者·编者的话》,第XVI页。香港,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。

朦胧诗在传播、论争中确立其地位,也同时建构自身的“秩序”。这涉及到朦胧诗的定义,“代表性”成员和作品的认定,朦胧诗的“起源”与流变,朦胧诗与文革中的“地下诗歌”的关系等<sup>①</sup>。影响、制约建构的主要因素有:论争中某一作品引例的“频率”;重要批评家和当事人的观点;作品“性质”(思想与艺术方法)与当时社会、诗歌主潮的切合程度;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发表方式;诗人与当时诗歌运动的关系;诗歌选本的编选、流通情况等。

在朦胧诗论争期间,诗歌界对朦胧诗的特征、指称的对象等,认识大体相近。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;特别是在新诗潮内部。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哪些诗人、哪些作品可以划入“朦胧诗”,哪些诗人可被看作是朦胧诗的“代表”?从80年代前期一些诗歌选本和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到,这方面的“认定”是同中有异<sup>②</sup>。对个别诗人应否进入朦胧诗行列的分歧可能不是看得那么紧要,但对另一些诗人在朦胧诗中的位置,特别是牵涉到所谓的“核心”、“代表”诗人的认定,事情就会变成含糊不得。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那种“五人”(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江河、杨炼)格局<sup>③</sup>,显然不能被普遍接受<sup>④</sup>。



① 赵寻的《80年代诗歌“场域自主性”重建》一文对此有深入讨论。该文收入《激情与责任》一书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。另见《今天》2002年秋季号(总58期),今天文学杂志社2002。

② 可以注意的一些现象是:在《今天》上发表诗歌作品的有些作者,在朦胧诗论争中并没有被较多提及,如食指、芒克、方含、严力等。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印的《朦胧诗选》(油印本),收入舒婷、芒克、北岛、顾城、江河、杨炼、梁小斌、王小妮、吕贵品、徐敬亚、杜运燮、傅天琳12人。徐敬亚《崛起的诗群》(1983)一文中列举的诗人名单,比起《朦胧诗选》(油印本)来,删去了芒克、徐敬亚、吕贵品、杜运燮,增加了孙武军。1985年《朦胧诗选》(阎月君编,修订本,春风文艺出版社)比起油印本,删去杜运燮,加入孙武军。徐敬亚等编的《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—1988》(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)中,列为“朦胧诗派”的成员是:北岛、江河、芒克、多多、舒婷、杨炼、顾城、骆耕野、梁小斌、王家新、王小妮、徐敬亚12人。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多种当代文学史、诗歌史著作、教科书中,多数将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江河、杨炼作为最重要的评述对象。2002年《朦胧诗选》再版时,增加了食指和多多。

③ 1986年,作家出版社出版了《五人诗选》,收北岛、舒婷、顾城、江河、杨炼5人的作品。这显然暗示他们是朦胧诗的“代表诗人”。此后的一些文学史、诗歌史论著,采用了这一认定。

④ 多多在写于1988年的文章中讲到,“常常,我在烟摊上看到‘大英雄’牌香烟时,会有一种冲动: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,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天飞上天空。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它法。”文章显然拒绝当时朦胧诗“核心诗人”的那种排列。该文刊于《开拓》1988年第3期,后收入廖亦武主编的《沉沦的圣殿》一书,篇名为《被埋葬的中国诗人(1972—1978)》。收入刘禾主编的《持灯的使者》时,篇名改为《1970—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》。

朦胧诗看法的分歧的另一方面,则是时间界限上的。朦胧诗是专指1978年以后几年中“出现”(在这段时间写作;或不写在这一时间,但在此时“发表”)的诗,还是包含更长的时间段落?具体地说,朦胧诗可否上溯至六七十年代的“文革”时期,而下限又可否延伸至朦胧诗人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?在这个问题上,开始人们更多承认比较严格的“朦胧诗”概念,待到朦胧诗的地位确定,声誉日隆之后,概念便朝边界不断拓展的趋势推进。朦胧诗概念的扩大,与80年代后期开始的“地下诗歌”发掘的工作,处于互动的关系中。

80年代初,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在“文革”期间,存在过后来所称的“地下诗歌”;虽然当时有一些诗作,发表时篇末注明是写于“文革”的某一年份。事实上,《今天》(尤其是最初几期)所登载的诗,不少据说是“文革”间的旧稿<sup>①</sup>。这些诗,除作者本人提供外,许多由当时参加《今天》编辑的赵一凡<sup>②</sup>提供。随着朦胧诗影响扩大,“朦胧诗”的“起源”问题,以及“文革”中与“朦胧诗”具有相似美学特征的诗歌现象,受到关注;相关的材料开始披露,某些事情被着重讲述。多多的写于“文革”和80年代初的诗发表:1985年初出版的《新诗潮诗集》<sup>③</sup>收入他的30余首(组)作品。他是朦胧诗已成“历史”时才被确认的“朦胧诗人”。北京60年代初“诗歌沙龙”的情况也被发掘;它们被处理成后来“地下诗歌”的“根”<sup>④</sup>。这指的“X小组”(郭世英、张鹤慈为主要成员,有的文章称“X诗社”)和“太阳纵

① 如芒克、北岛、食指、方含、齐云等刊发于《今天》的许多作品。

② 赵一凡(1935—1988),浙江义乌人,生于上海。自幼因伤致残,只上过三年小学,靠自学完大学中文学科课程。为商务印书馆等担任辞书和古典文学书籍校对工作。他“最重要的贡献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和整理”,在“文革”期间,因保存了被称为“地下文坛”的大批资料,在1975年1月,以“交换、收集、扩散反动文章”和参加并不存在的反革命组织“第四国际”的罪名,被捕入狱。1976年12月出狱。两年后获平反“恢复名誉”。1988年病逝。生平资料参见廖亦武主编《沉沦的圣殿——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》第三章赵一凡专辑。《沉沦的圣殿》第129页称,“至少《今天》前4期或前5期的绝大部分稿件是赵一凡提供的。”

③ 《新诗潮诗集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老木(吕林)主编,上下两册,署“内部交流”,为“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”。收八十余位作者的诗作。其中多多有三十几首(组)作品。作为附录的“中国现代诗20首”,分属李金发、朱湘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穆旦、艾青、郑敏、废名、陈敬容、杭约赫、唐祈、纪弦、辛笛、袁可嘉、唐湜、郑愁予、洛夫、余光中、杜运燮、蔡其矫。这可以看作编辑者当时对“新诗潮”的“源流”的理解。

④ 《沉沦的圣殿》一书把“X诗社”等的活动,称为“时代之根”。第1—3页。

队”<sup>①</sup>。也发掘了黄翔的早期写作(60年代初),提及贵州“启蒙社”的活动;但对黄翔、“启蒙社”是否与朦胧诗有关,人们存在不同看法<sup>②</sup>。“地下诗歌”发掘的最醒目成果,首推食指和“白洋淀诗群”的发现。

关于“文革”间白洋淀的诗歌活动,80年代中期有的文章已有介绍<sup>③</sup>。1988年多多的被经常征引的文章《被埋葬的中国诗人》<sup>④</sup>,对发掘、整理食指与“白洋淀诗群”的历史,起到重要作用。朦胧诗运动期间,《今天》发表过食指的一些作品,《诗刊》也登载过他的《我的最后的北京》。但由于身体状况等方面原因,他的名字不为关注朦胧诗的读者更多了解。似乎要被“掩埋”的这种迹象,引起那些认为“食指是开辟一代诗风的先驱者”的人们的忧虑<sup>⑤</sup>。出于“还原”历史“真相”的动机,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,开始了重新“发现”这一“当年在一代青年中广为传颂

① 《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》(牟敦白)、《“太阳纵队”传说及其它》(张郎郎)。收入《沉沦的圣殿》一书。

② 贵州的黄翔、路茫、方家华、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“启蒙社”,于1978年10月来到北京,在王府井大街贴出总题为《启蒙:火神交响诗》的共一百多张的诗歌大字报。接着,12月到次年3月间又五次到北京。北岛1992年在伦敦的“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”上说,“……到了1978年的时候,突然政治气候转变了。我记得一个转变的最重要的迹象,就是1978年10月11号,在王府井大街贴出了黄翔和几个贵州青年人的诗。”“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,……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。”(转引自钟鸣《旁观者》第二卷第769页。海口,海南出版社1998。)黄翔在给钟鸣的信(时间不详,大约90年代中期)中,抱怨他们的写作与活动,在有关朦胧诗的叙述中被忽略。“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,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,其实是无论从时间的早晚、从民刊和社团活动、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关,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60年代末期,……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,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。”(见钟鸣《旁观者》第2卷。)

③ 贝岭《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》,最初刊于在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《华侨日报》1986年12月25日。

④ 刊于《开拓》1988年第3期。这篇文章收入廖亦武主编的《沉沦的圣殿》一书时,篇名是《被埋葬的中国诗人(1972—1978)》,收入刘禾主编的《持灯的使者》中,篇名为《1970—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》。

⑤ 林莽《食指论》,《诗探索金库·食指卷》序,北京,作家出版社1998。黑大春在其诗论中,将“大诗人”食指的命运,概括为“过早的先驱,过迟的春天”,说“你犹如时代的抹布/擦去灰尘,又被弃于尘土”,见黑大春编《蔚蓝色天空的黄金·诗歌卷》第116页,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。多多的《被埋葬的中国诗人》首先提到的就是食指(郭路生),称他从“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,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”。





的、传奇式的诗人”的活动<sup>①</sup>。食指的当代新诗潮先驱者的地位，为不少人所认同。而“白洋淀诗群”的发掘和历史编纂也有计划进行。最见成效的是1994年5月以《诗探索》(北京)编辑部名义组织的“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”的系列活动。曾经与白洋淀诗歌有关的原“知青”，集体“寻访”故地，举办讨论会，撰文讲述当年情景，披露“有研究价值的原始资料”，继续了多多等开始的对自身“历史”的建构，并为这一诗歌事实做出“白洋淀诗歌群落”的命名<sup>②</sup>。在20世纪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，“地下诗歌”发掘和“新诗潮”重叙的重要成果，除食指和“白洋淀诗群”的“发现”外，还出版了作品集《中国知青诗抄》和《沉沦的圣殿——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》。在《今天》创刊20周年的时候，《持灯的使者》<sup>③</sup>——一部集合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的“细节文学史”在香港出版。

以朦胧诗作为基点所进行的历史发掘、整理，存在着复杂、矛盾的态度。一方面，因着这种整理，朦胧诗不再成为无根之木，无源之水；中

---

① 1988年，漓江出版社(南宁)出版了他的诗集《相信未来》。1993年，他与黑大春的诗歌合集出版；北京作协分会的诗歌委员会举行了食指作品讨论会。同年出版的“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”(北师大出版社)的《朦胧诗卷》中，选入食指的诗10首。1994年，《诗探索》(总第14期)开辟了“食指专栏”，刊发了食指创作谈，和林莽的《并未被埋葬的诗人——食指》的论文。在后来的几年里，北京多种报刊刊发了对食指的专访，和诗评家、他的朋友的评论、回忆文章多篇。人民文学出版社“蓝星诗库”出版了《食指的诗》。

② 《诗探索》(总第16期)的“当代诗歌群落”专栏，集中刊登了他们回忆“文革”白洋淀诗歌活动的文章，作者有宋海泉、齐简、甘铁生、白青、严力等。专栏的“主持人的话”(林莽执笔)，表述了他们在寻访讨论中形成的共识，以“这段诗歌活动的亲历者”的身份，提出对这一诗歌“群落”的叙述方式和“定位”的主张。这里的引文，均引自“主持人的话”。

③ 《中国知青诗抄》，郝海彦主编，北京，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。《沉沦的圣殿——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》，廖亦武主编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。《持灯的使者》，刘禾编，香港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。《中国知青诗抄》一书还刊有“续编”的“约稿启事”，要当年的知青“努力回忆、翻找旧作”，“一般不要修改”，并“注明创作日期”。这种构造“历史”的方法有其“可疑”的一面。